



西南人类学文库 流域与族群互动系列

田 阡/主编

族

ZUQUNXING DE CHENGBIAN

MIAOJIANG BIANYUAN XIUSHAN MIAOZU DE SHENGHUO

群性的承变：
苗疆边缘秀山苗族的生活

向 弑 | 著



人民出版社



重庆文理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西南人类学文库 流域与族群互动系列

田 阡/主编

族

ZUQUNXING DE CHENGBIAN

MIAOJIANG BIANYUAN XIUSHAN MIAOZU DE SHENGHUO

群性的承变：

苗疆边缘秀山苗族的生活

向弑 | 著



人民水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族群性的承变:苗疆边缘秀山苗族的生活/向轼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ISBN 978-7-01-016016-0

I. ①族… II. ①向… III. ①苗族-民族学-研究 IV. ①K28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6305 号

族群性的承变:苗疆边缘秀山苗族的生活

ZUQUNXING DE CHENGBIAN MIAOJIANG BIANYUAN XIUSHAN MIAOZU DE SHENGHUO

向 轼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56 千字

ISBN 978-7-01-016016-0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西南人类学文库

序 言

人类学于 20 世纪初被引进中国，其研究一度繁荣。1923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主持之下，南开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初，全国许多院校，如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大夏大学、中央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广西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学院等校纷纷设立人类学研究机构，或者在社会学系中开设与人类学相关的课程。北京大学等校虽然没有设置系科，但也开设了人类学、民族学课程。抗战胜利后，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辅仁大学先后建立人类学系。1952 年院系调整，国内各大学的社会学系、人类学系和民族学系先后撤销，人类学中研究体质的部分基本保留下来，但被归并到生物学或古生物学之下；研究人文与社会的那部分则被调整到历史学内，或以“民族研究”的名义得以延续。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人类学地位重新得到恢复。1981 年，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设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同年获得博士授予权。随后，厦门大学也建立了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设人类学、考古学两个专业。中央民族学院于 1983 年建立民族学系，1993 年该校成立民族学研究院，2000 年 9 月改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于 1978 年成立，设有民族学与人类学专业，并于当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 年起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于 1985 年 3 月，是一个以研究为主、教学为辅的机构。此外，云南大学、

中南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一些综合性大学和民族学院（大学）也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或民族研究所，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现阶段，本科开设人类学课程的只有中山大学及一些民族学院（大学）。截至 2009 年止，全国共有二十多所高校院所在民族学、社会学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类学硕士授予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 9 所大学设立了人类学博士点。其中，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人类学专业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10 年国务院学位办将博士授予权下放到部分重点高校，一部分高校增设了人类学博士点，如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人类学研究这些年来在中国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 2009 年世界第 16 届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在中国召开后，发展迅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越来越多的人类学、民族学机构的建立。根据相关的统计，研究机构已经超过 100 个，专业研究人员超过 5000 人。二是越来越多的高校建立起硕士、博士学位点，除了“985”高校外，部属和各省的民族院校普遍建立起学科点。三是各类学术活动亦越来越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是最大的学会，每年举办年会和学科单位负责人会议，其下属的各分委员会亦举行各种专题会议。民间团体“人类学高级论坛”每年举行年会和青年圆桌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 12 届，2013 年还首次在台湾地区举办了论坛。四是各类研究课题在国内外展开，尤其是海外民族志方兴未艾，各种专著、文章更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笔者认为重庆这片区域在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首先是重庆的地理位置，其位于中国的腹地，在习惯上称之为“西南”，实际上在中国地理位置上是中部偏东。地处长江上游，是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过渡地带，古往今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次，重庆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 200 万年前的“巫山人”到农业起源时的新石器文化，从别具一格的巴国青铜文化到石盐生产中心。再次，重庆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古往今来族群互动繁多，迄今还保留 4 个民族自治县（原来有 6 个民

族自治县)，分布着上百万的土家族和苗族人口。最后，重庆是西部经济核心地区，是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的交通枢纽，是中国制造业、高科技、高等教育的核心区。当前重庆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社会、文化急剧变迁，为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重庆自成为直辖市后，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也获得了高速发展，可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对滞后。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西南大学作为重庆人文社会科学的重镇继续担当着领头羊外，重庆大学也建立起高等研究院和相关的社会科学院以弥补单纯理工科大学之不足。近来，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在重庆也有了欣喜的进步：首先是在西南大学建立了相关机构，开展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并招收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接着是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建立了人类学研究中心，聘请海外专家做中心主任，已经举办了相关的学术会议和人类学系列讲座。在重庆文理学院也开展文学人类学、文化遗产的研究，还承办了2013年人类学高级论坛。

重庆人类学、民族学的进步与田阡及所在团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本丛书的出版正是该团队近年来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从本丛书看其研究在如下几个方面是有所突破的：

田阡的团队立足武陵山区与乌江流域，以区域自然与人文生态为基础，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基础，将文化总体特征与多样性相结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区域文化互动关系研究。同时，运用区域研究的方法，坚持整体观与跨文化比较的研究取向，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视角，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龙河流域区域文化与族群关系研究”和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项目“中国节日志·春节（重庆卷）”为依托，对该区域文化的共同特征和多样性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对区域文化进行具体的分类研究。将区域文化分为民族艺术、民族体育、民族音乐、民族手工艺、民族舞蹈等方面，从民族文化形式、内涵、传承、文化产业等角度对不同的民族文化作了专题调查研究，凸显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根基及传统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其次，运用人类学的进化论、整体观等理论与方法，通过多点式田野调查，

对该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最后，对区域文化开展总体性特征的研究。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生计方式、价值体系、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和制度体系等角度，对武陵山区和乌江流域的区域文化作综合分析，总结该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文化价值。

田阡的团队以都市为研究场域，以城市化进程中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为基础，以族群流动与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丰富的都市少数民族社会管理问题研究。区域文化的整体性与多样性是在族群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关注区域文化研究的同时，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生计模式与身份认同研究”，展开都市族群关系问题研究。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了原有流域个体、单一民族研究的思路，通过社区研究对族群互动关系的多样性作了综合分析，推动了学科互动研究。他们对大都市的散杂居状态进行了深度剖析，利用科塞提出的社会安全阀理论，创造性地将城市民族事务部门定位为城市民族工作的“安全阀”，指出城市民族事务部门应充分利用自身各种优势，在日常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方面，发挥资源动员和服务传递的职能，充分发挥“安全阀”的疏导、转化和催化作用，推动城市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

田阡的团队将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相结合，关注历史上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中心与边缘”互动关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族群与区域文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已有的区域历史研究基础上，通过历史文献的分析和大量的田野调查，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对不同民族和不同区域的生活状况进行了研究和评价，对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创新性的、历史性的演绎与归纳。同时，以历史事件的反思关照现代地方社会发展的的问题，对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进行了分析，为解决当前的民族关系问题提供了更加系统的理论支撑和明确的决策参考。如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以苗疆社会自身为研究视角，从苗疆民众的日常生活分析出发，对苗疆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新的理解与评价，为西南边疆与民族历史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该成果凸显了民间组织与民间行为规范的社会价值，对于解决中国基层社会的现实问题、维护基层社会的社会秩序提出了新的路径，

推动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田阡教授嘱我为西南人类学文库写个序。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下来。田阡十多年前就读于我的门下，毕业后去了西南大学。在那里，他将人类学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将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相结合，在人类学基础薄弱的重庆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特别是在流域人类学领域所做的研究和思考更有新意。当老师的最高兴的莫过于学生能够做出成绩。这也是我愿意写序的原因。最后，祝愿田阡的团队能有更多的成果问世，祝愿重庆的人类学有着美好的明天！



2013年11月27日

重观西南：走向以流域为路径的 跨学科区域研究

学术从来不是静止的，我们的探索永远是理论和实践上的无尽开拓。无论做哪一学科的学术研究，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利奇（E. R. Leach）在其代表作之一《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中提到人类学研究中的“蝴蝶论”：当时很多研究者的工作，就像搜集各种蝴蝶标本一样去搜集各种人类文化现象。他认为这些文化现象搜集得再多、再全，如果不去深究“蝴蝶”的归类、“蝴蝶”的演化等问题，对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就没有多大帮助。同样，当我们回头去看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强调在古典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基础上要对比方法方法进行革新，放弃使用先验的阶段论，转而做共时的比较，从而看到事物和事物之间关系的理念时，就可以确信这样的学术思维可以理清一条通过认识事物，进而认识人类社会的主线出来。

一、方法论转向：从社区研究到区域研究

源于结构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长期以来都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为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世界性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事实上，只要对学术史稍作梳理即不难发现，社区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在人类学传统的社区研究中，其实存在着“社区研究”和“在社区中做研究”这样两种研究取向。一直以来，大多数的中国研究者都传承了人类学民族志的传统，将社区视为可操作单位，对其进行“麻雀解剖”，以期代表中国，至少代表中国社会的一种“类型”

或“模式”。然后试图通过类型比较方法达到对中国整体的认知。

费孝通先生在后来的《云南三村》序言中反思《江村经济》，承认《江村经济》做的是社会调查而不是社会学调查，他在《云南三村》中的类型比较研究，可以看做是对“利奇之问”的回应。这段学术公案众所周知。利奇质疑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方法，“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① 费孝通先生坦承“江村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但他认为，“如果承认中国存在着江村这种的农村类型，接着可问，还有其他哪些类型？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的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②。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对社区的研究”，而进入了“在社区中做研究”，而且是做更大范围或规模研究的新视野。在这种类型比较法的信念下，费孝通先生从“江村”走到“云南三村”走到“中国小城镇模式”乃至“区域社会”，为理解中国奉献了毕生精力。这种研究传统至今仍然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其影响下，我们的研究不但要思考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宏观与微观的链接，而且事实上还是一种加入了他者文化关怀的研究。一方面，区域社会的地方知识体系在支撑着“传统”或“他者”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地方性的问题已经成为国家治理技术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在地方社会中实践和权力展演的空间。

作为学术工作者，我们既要时刻警醒自己将自身的世界当做众多世界中的一个，寻找他者历史与社会的独特运行逻辑，同时也要“追问流行于不同的地理单位中的宇宙观在互相碰撞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不同’”。^③

①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读书》1990年第10期。

②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读书》1990年第10期。

③ 王铭铭：《人类学：历史的另一种构思》，载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9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55页。

区域研究作为人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人类学学科起源和兴起的过程中，还是人类学学科理论与学科流派的形成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区域个案的研究来认识区域整体。在全球化时代，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使原有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遇到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人类学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却从未动摇过。区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只是比以前更加强调人类学理论上的批判性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科学训练而已。

二、对象转向：从族群研究到流域研究

人类学家周大鸣教授曾指出，族群的认同必须在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去探讨，在与世隔绝的孤立群体中，是不会产生族群认同的，至少族群认同是在族群间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认同和互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局面。^①事实上，包括地域性在内的现实认同在具体的时空下也是重要的族群认同操作工具。生活在同一区域的群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受到政治的、市场的、历史记忆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而使族群认同和族群文化处于动态的变迁之中，这是历史的建构过程，也正在现实中发生着。

孤立的群体研究方法也无法把握族群之所以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族群文化归纳，如果缺乏时空格局意识，就会忽视地方社会的族群关系、地域关系和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从而造成对区域文化地方性差异以及差异形成过程的关注的不足。

以空间、历史与族群互动为视角的区域研究，并不是单一的区域史，而是人类学上文化整体观和比较研究传统的延续，也是对中国地方社会研究中历史研究取向和区域文化研究取向相结合的进一步深入。这种研究视角以发现具体历史社会情境中地方社会与族群社会的关系为目的，去揭示

^① 周大鸣：《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9期。

国家、社会、地域、宗族、个人等多层次的社会力量在多样性的具体“历史真实”中的整合以及民间生活中“文化创造”的多样性，并最终通过“过程民族志”的方式展现传统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①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局部整体性的把握，是对中华文明总体整体性进行理解的必经阶段和重要步骤。因此将族群文化研究与地域进行结合，将族群与族群互动嵌入具体的时空轴进行审视就显得尤为重要。

地理自然环境因素天然地对区域社会形成具有形塑作用，而经济、政治、文化关系是区域社会形成、分化和变迁的重要基础。同时，把握地方社会形成及变迁所需要考察的区域族群关系、政治层级、经济关联、地理空间等社会结构性界线都包含在区域社会之中而不是以族群为边界。作为族群互动的具体时空坐落，区域社会正是进行地方社会文化研究的可操作单位。它有可能突破传统研究重视客观文化表征，忽视地域关系、族群关系的局限。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的研究不应拘泥于族源、客观文化表征以及单一族群历史方面的考察，而应将其作为资料性素材，重点通过对区域空间内的族群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把握，从河流区域与族群文化角度对族群研究进行田野调查和理论层面的探讨。

流域，正如龙宇晓教授所言，“是以河流为中心的人—地—水相互作用的自然—社会综合体，以水为纽带，将上中下游和左右岸的自然体和人类群体连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人类生活世界的本体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流域是群集单元，是世界本体的一部分。用地理学的说法，流域是一条一条的河流和分水岭形成的山水基线；从文化的发生角度看来，流域就是一条条的文化赖以起源、演化、传播、交融与发展的时空通道；从整体观的视角看，流域还是一个体系架构，由大大小小的流域线条网络形成一个个的区域扇面。就社会内涵角度而言，

^① 彭兆荣：《边陲族群：远离帝国庇佑的客人》，黄山书社2006年版。

^② 曾江：《作为方法的流域：中国人类学研究新视角——流域人类学大有可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9日。

流域是一个问题域，集结了诸如生态、人口、资源、民族、族群关系等各方面的问題；从方法论角度讲，流域则可以作为一种认知范式，从流域的角度看待问题，可能和过去泛泛的看待问题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能用流域的方法，从流域的角度看问题，肯定能够发现以往我们不能发现的很多知识的盲点。

流域是世界本体的一部分，这与流域的性质有关。流域在国外的理解各有不同，有广义的 valley，还有一个狭义的 watershed，即分水岭。希罗多德曾说“埃及是尼罗河馈赠给人类的厚礼”，深入理解他的话，可以说整个人类的文明都是和流域有关系的。马克思说“尼罗河水涨落启示，诞生了埃及数学”，可见流域不仅仅是文化的问题，也与地方知识、科学知识有关。流域重要性在于它既是自然资源的群集单元，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承载单元，更是我们认识社会的一种方式。顺着河流，就有物的交流、人口的流动、文化的传播和分布。流域作为一种系统的架构，是一个人、地、水互动的复杂系统，从中可以分成很多子系统，可以在这个系统层面发现很多现实问题，诸如生物多样性问题、传统知识的传承保护问题等。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流域的视角，我们能够在研究中不断发现新的资源，给老的问题赋予新的意义，并最终解决这些问题。

作为范式创新的一个出发点，流域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超越以往点状认知的局限性，超越现在人类学区域研究上一个个民族志点之间缺乏关联的局面，还可以超越“边缘—中心”的理论范式。正因为如此，流域人类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实现文化整体观照的目标；流域的研究、流域的视角、流域的方法，或许能够真正推动人类学成为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

三、空间转向：从东南研究到西南研究

中国研究的空间转向经历了从西南到东南再回归西南的历程。如西南彝学研究的现代学术确立开端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杨成志先生。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专业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开始进入西南地区，进行民族社

会调查，留下许多重要的调查成果。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先驱杨成志先生在1928年9月至1929年5月，孤身深入凉山进行民族调查，后来结合云南的一些调查撰写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被称为“我国西南民族调查的先导杰作”，后来出版的论文集《云南罗罗族论丛》被称为“罗罗研究的第一本巨著”。^①此外，袁家骅、李仕安、江应樑、陶云逵、林惠祥、芮逸夫、马长寿、林耀华等诸多民族学和人类学大家都曾进行过西南地区社会文化调查和研究。他们融会贯通，将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数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整合运用，写就了一批经典之作。相比于华北农村研究和东南宗族研究后期崛起，西南族群研究的传统曾一度陷入低潮。随着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提出关于“藏彝走廊”的论述，人类学研究的目光又逐渐回到西南。

自1980年民族学人类学学科重建以来，西南研究的“区域研究”特征也日益明显。特别是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成立，更标志着西南研究区域视野与实践的开启。在该学会的推动下，西南研究的学术力量被整合组织在一起，进行了一系列“流域”“走廊”“通道”等具有较强区域性研究的专题调研，如横断山区六江流域、西南丝绸之路、贵州“六山六水”、南昆铁路沿线、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等研究，从而开启了学科重建以来西南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②

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曾经在村落个案的基础上，由国外中国研究者和台湾学者先后提出了市场体系理论、祭祀圈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华南研究理论等范式，将连接一个个村落的关键，或认定为村庄集市网络内的交换关系，或认为是为了共同的神灵信仰而举行的祭祀活动的居民，或归结为某一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宗族、信仰及社会整合。^③这些研究范式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缺陷，这些缺陷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只能解决相对较小范围内的区域研

① 王水乔：《杨成志与西南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第55页。

② 张原：《“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民族学刊》2014年第4期。

③ 周大鸣、詹虚致：《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脉络与反思》，《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究问题，一旦将其置换于其他环境之中，就会遇到严重的“水土不服”情况。在实地的调查和研究中我们发现，地理自然环境因素天然地对区域社会形成具有形塑作用，而经济、政治、文化关系是区域社会形成、分化和变迁的重要基础。同时，把握地方社会形成及变迁所需要考察的区域族群关系、政治层级、经济关联、地理空间等社会结构性界线，都包含在区域社会之中而不是以族群为边界。作为族群互动的具体时空坐落，区域社会正是进行地方社会文化研究的可操作单位。

我自进入西南大学以来，结合区域研究和西南研究的新传统，带领团队在龙河流域开展了持续性的区域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龙河发源于鄂渝交界处的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水国家森林公园冷水镇李家湾七曜山南麓，全长 164 公里，天然落差 1263.3 米，其中在石柱境内有 104 公里，是石柱境内最大的河流。龙河流出石柱县后，在丰都县王家渡注入长江。龙河穿越石柱和丰都两县 20 多个乡镇，因流经石柱县城南宾镇，绕城三面，龙河在石柱县内又称“南宾河”。龙河流经的地区地处鄂渝交界地，当楚黔之交，控楚连黔，襟带湘境，自古为洪荒之地，是巴蜀古国最边远的山区，古称“九溪十八峒”，也是土家族的祖先古代巴人的聚居区。我和我的团队对龙河的人类学研究是从《冷水溪畔》开始的，陆续有《万寿山下》《沙子关头》《龙河桥头》《边城黄鹤》等传统村落的系列调查研究，还有《“边缘”的“中心”》等呈现族群互动的系列研究，以及流域内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至此，一个以流域为路径的西南区域研究的新人类学空间正在凸显。在冷水镇开展田野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贯穿石柱县的龙河的源头，也在于它已被置于流动和发展的背景之中，需要尽早地描述和挖掘。而在西南地区流淌着很多与龙河一样的小流域，都存在着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族群多样社区，对学术研究的标本作用以及田野调查方法的训练都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场域。我们期待能通过做一条河流的上、中、下游不同社区的研究，构建起对该流域整体性的文化和社会认识，继续寻找文化的相似性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也为武陵山区和西南的多流域研究拓宽、拓新思路与方法。

面对新时期全球化浪潮下对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迫切呼唤和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失语，在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区域研究蓝图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岭南研究与珠江流域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总结七年来集中于西南地区的流域研究的理论与田野调查，初步得出了一些关于人类学区域研究，尤其是中国西南山区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规律与方法。

四、学科转向：从人类学洞见到跨学科协同

我们认为，流域文明不仅是流域文化、流域历史，更应关注现实的流域治理问题，进而参与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讨论中去，因此，挖掘流域文明，其根本目的应该是更好地从点、线、面三个层次上为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指导。

第一，流域文明凝聚社会治理的文化意蕴。水是流域文明的主体，水的特性在于它的流动性和循环性。水的流动性体现在它最一般的液态，水的循环性体现为它在“三态”间的转化。水在沸点化为气态，在冰点结为固态，但是无论如何蒸发和凝结，它都在循环往复之中保持自身的存在。水也在“三态”转化之中实现着自身的充斥和弥漫。一地一域之水受到污染，水的流动性就会促使污染在更大范围内持续扩散；一堤一坝存有缝隙，水就会在引力作用下发挥出“柔弱胜刚强”的特性；水库不坚，水道不通，暴雨积累起来的洪涝就会引发灾难；水源的开通、引调、提升的不足则会引发缺水困境；水管查漏减损、废水再生利用和雨水收集的工作不济，就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水的这些特征，决定了治水思维的系统性和治水形式的协同性特征。水的文化产生于人与水的历史互动性实践中，内涵在世界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之中。人类在用水、治水、护水等实践中不断构建文明史，在渡河、越江、航海等活动中不断构建世界历史。从中华民族范围看，松花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以及东南、西南、西北地区诸河流域，孕育了先哲对水的哲学思索，凝结了历代水利工程的科技文化，汇聚了各朝文人对水的人文赞美。

第二，流域文明突显社会治理的系统关联。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但

是其发挥功用需要依靠人对于水的规律的科学把握。山水林田湖之间的辩证运动构成生态系统，水的规律即是在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人们对于自然界的作用逐渐多样化，导致水的规律发挥的作用机制也变得日益复杂化，人们治水的机制也日趋系统化。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因此治水必须具备统筹协调的战略思维。

第三，流域文明反映社会治理的本质属性。人对水的治理体现的是人通过物质实践以文明的形式获得对以水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和驾驭能力。治水直接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为了维持自我生存与生活，对于水的实践形式包括探寻水、储存水、去污水等。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类以傍水而居作为寻找充沛水资源的最直接方式，因此早期人类文明几乎都起源于各种大型河流。丰沛的水源有助于化解供水与节水的矛盾，但是也带来了洪水和涝水的矛盾，因此，以泄洪水、排涝水为核心内容的治水也几乎成为所有早期人类文明面临的必要任务。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作成为人类利用和驾驭水资源的重要形式，人们在治水中不断探索和改进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机制，以便更加积极有效地应对水的问题，实现人与水的和谐相处。

因此，在这一系列理念体系统领下，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以流域为主题开展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公共政策、农业科技史等多学科对话的系列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付诸具体社会治理问题的实践。除了流域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我们计划从历史流域学中吸取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并将研究对象拓展到跨境流域研究与跨境社会治理方面，分别从三江源地区的流域生态学、珠江流域宗族与族群、松花江流域的农业人类学、大运河的考古与治水历史、武陵山地区多流域切入，探讨复合的人—地—水系统中的社会治理问题，最后将流域与社会治理的理念上升到生态美学的人地和谐与社会哲学的天人合一层面。

我们期望今后能够通过“流域”这个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的概念，加强